



●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

我与民盟

群 言 出 版 社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

78824

D6652/10

D688/35

我与民盟

中国民主同盟文史委员会编

群 言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台双垣

我 与 民 盟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4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80-001-6/K·1 定价：4.75元

26/26/05

目 录

民盟工作的片断回忆·····	楚图南	1
政治上的启蒙·····	费孝通	8
我与民盟的历史渊源·····	胡子昂	13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论机关《光明报》前后·····	梁漱溟	19
风风雨雨的四十五年·····	黄大能	30
一桩险事·····	叶笃义	37
山雨欲来风满楼		
——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前后·····	罗涵先	39
冒万险迎曙光之到来·····	潘大逵	45
往事萦怀五十年·····	冯克熙	53
四川大学“三教授事件”·····	彭迪先	61
怀念特园，怀念鲜特老·····	唐弘仁	66
往事的回忆·····	冯素陶	71
我的人盟·····	张毕来	75
加入民盟前后·····	尚 丁	78
难忘的一段经历·····	秦柳方	82
古城黎明之前		
——民盟北平市临工会活动追忆·····	关世雄	87

难忘的会见·····	李 柱	96
不畏强暴 敢于斗争		
——记政治协商会昆明促进会的一次活动·····	杨绍廷	100
我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植恒钦	104
桂林的峥嵘岁月·····	潘国贵	110
湖南工作散忆·····	罗 毅	115
呐喊与战斗		
——民盟在成都大学区的革命活动·····	刘琦行	117
浩气震鬼魅 热血慰忠魂		
——民主斗争的片断回忆·····	胡静之	120
中央大学民盟组织的斗争回顾·····	李炳均	125
记《华西晚报》的副刊·····	陈白尘	132
难忘的《民联日报》·····	陆慧年	139
在《光明报》工作的日子里·····	陆 诒	142
《活路》杂志的诞生·····	周沙尘	147
在历史激流中奋进·····	赵家欣	150
我在西北民盟的短暂经历·····	徐景星	154
《自由画报》的战斗历程·····	牟康华	157
三生有缘·····	陆进贤	162
我在民盟的一段工作·····	吴大理	166
一项特殊使命·····	孙文芝	169
学无止境·····	时宜新	172
难忘的一九四七年·····	顾菲君	174
雅荣道上送情报·····	李毓松	177
迎接新中国·····	罗自梅	179
港九杂忆·····		
	高 天	181

海外民主之声

- 我和民盟英国支部 陶大镛 187
- 在旅泰支部的日子里 韩毅之 193
- 在新加坡的一段经历 叶帆风 196
- 关于民盟马来亚支部的一些回忆 汪金丁 200
- 我的母校——达德学院 高山 204
- 丹心傲骨震群邪
- 民盟苏门答腊支部活动片断 熊雨鹃 209
- “神仙会”前夕 李文宜 213
- 新时期的十年 吴春选 217
- 苦在其中 乐在其中 王麦初 224
- 想过去,看现在,望将来 曹思彬 228
- 不忘教诲 李 骅 232
- 回忆与思考 陈敏之 235
- 不解之缘 田道正 239
- 指导·帮助·激励·支持 缪 钺 243
- 难忘的教诲 于 友 247
- 年过半百写新篇 鲁秉铃 251
- 人生有限 事业无穷 赵一明 254
- 走出书斋 周 雷 257
- 良师 曾祥邹 260
- 我爱你,民盟 冉晓仲 263
- 我的精神家园 赵登蔚 266
- 梅开二度 徐成巧 269
- 回想起一张大字报 陈栢康 272
- 人生指南 邓碧玉 275

悠悠岁月 耿耿追求·····	圭 苑	277
深情厚意 刻骨铭心·····	刘庆来	280
八度春秋·····	董显仁	283
新人接力勇争先·····	郑泽宇	285

民盟工作的片断回忆

楚图南

抗战期间我在昆明，当时担任云南大学的教授，同时广泛接触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及青年学生，还有部分产业界的人士和故乡耆旧。在这些人中间，大家对开展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促进社会进步交换意见，并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当时，北方一些大学都从沦陷区迁到昆明及昆明附近，一些国内知名的学者，进步的知识分子也都先后到达了昆明，因此一时间，昆明的进步文化活动，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和文化艺术等活动都十分活跃。

就是在这个时候，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久，民盟派周新民、李文宜，以后又有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等到昆明开展工作。对于周新民和李文宜两位过去的革命经历我是早有所闻的，对他们的工作也是支持的，但是这时，我和一些在昆明的同志和朋友都还没有加入民盟。

二

1943年夏秋之夜，中共南方局的代表华岗同志（化名林少侯）到了昆明，公开的名义是和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等联络，当时叫清理和收容红军长征时散落在云南的人员。实际是按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并积极在知识界和云南的各阶层，特别在上层人士间开展工作。

在这期间，华岗同志发起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参加的人据我回忆除我外，还有闻一多、周新民、李文宜、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曾昭抡、冯素陶、辛志超、闻家驷、尚钺、潘大逵等人。当时我们征得了唐继尧之子唐小冥先生的同意和支持，在唐继尧的故宅唐家花园集会，每周一次，广泛地就各个方面如国际形势、抗战形势、云南政局、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动向，广泛交换意见。当时的活动，是由参加研究会的人轮流担任主讲，先由学术问题，以后逐渐引伸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当时有关民族存亡、国家前途等重要问题，广泛地进行讨论，其内容不断深入，交往亦不断增多。从不同地方来的，从事各种不同专业而且经历又各不相同的知识分子之间，关系变得融洽了，彼此了解和信任更增进了。后来，由华岗同志代表党组织倡议，我们这些人中大部分先后分别加入了民盟组织。这时已是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我们得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我记得当时介绍我入盟的是周新民、李文宜两同志。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和文化艺术界的抗日民主运动，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胜利的一个范例，是周恩来同志指导的在大后方工作成功的一个范例。其中在对知识分子，在对云南上层人士的工作中，

华岗同志的努力和功绩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另外，也还要说明，当时昆明的民盟组织，是以共产党的同盟者的身份出现，在团结省内外和扩大省内外的爱国统一战线，在西南掀起轰轰烈烈的团结抗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运动方面，以及在昆明不同经历、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中所做的工作和努力，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当时从事民盟工作的同志，以后陆续成为民盟各级组织的领导骨干，有的直至今日还在民盟内辛勤工作，可以说，他们为民盟工作贡献了毕生精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和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加剧，这时，我们按照华岗同志传达的中共南方局的意图，多方面做龙云的工作，一是希望他对蒋介石的阴谋有所警惕，二是希望他和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在云南的进步朋友保持联系。应该说，龙云是个懂得多方面应酬的人，一方面他对蒋介石还有某些幻想，以致在以后，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蒋介石用兵变的手法逼迫下台。另一方面，在受到蒋介石压力时，也有靠近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表示。据我所知，他曾以不公开身份为条件秘密参加民盟，并和民盟的领导人单独有些联系。此外，他还指派他的长子龙绳祖先生也以秘密的方式加入民盟。当时，民盟在云南的组织，由我和闻一多、冯素陶、赵凤等同志分别任主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及秘书长。我们商议，对龙绳祖这样在旧军队和云南地方实力派中涉足很深的人加入民盟，一定要对他做点工作，让他明白加入民盟不是一件随意的事，一定要给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经商量后，龙绳祖加入民盟要履行宣誓手续。我记得宣誓的地点是在城郊的龙云住宅的大厅里，我和闻一多、冯素陶是监誓人，背墙面南而立，龙绳祖面对我们念完了誓词。可惜的是，在此后不久，蒋介石策划，杜聿明在昆明发动兵变，逼龙云下台，并将其软禁

于重庆和南京。我们和龙云及龙绳祖的联系不能不受限制。此后我们也在李公朴、闻一多遇刺殉难后，离开了昆明。

三

我离开昆明以后，先到上海，见到了在马斯南路中共办事处工作的华岗同志并被引见了董必武同志。随即由当时在上海的民盟负责人沈钧儒介绍在上海法学院任教，并在上海参加民盟的活动，例如在上海召开过纪念李公朴、闻一多两同志的大会。中共的李维汉、邓颖超等都到会。国民党方面，迫于当时形势和国际舆论，也由潘公展等人到会。那次会的影响是很大的，邓颖超同志在会上宣读了周恩来同志的挽词，给与会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一心要打内战，同时加紧对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迫害。1947年底，民盟曾一度被强迫宣布解散。当时，我听从沈钧儒的意见，到了香港。沈钧儒同志认为民盟要坚持和国民党斗争，在上海，在内地无法活动，就到香港去。此后由沈钧儒、章伯钧召集的，在民盟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香港召开的。由于我正准备由海路北上，由周新民和冯素陶代表我出席会议。我则在1948年冬进入了河北平山县的解放区。在那里与先后到达的胡愈之、周建人、沈兹九等会合，一起迎接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四

1949年金秋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我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参加了第一届政协活动。这时，来自全国各地民盟的领导成员终于有机会在一起交换意见

了。因此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民盟在北京召开了四中全会。当然大家对民主政团同盟从改组为民盟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和共产党亲密合作，对民盟在全国解放前，在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民盟参与发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牺牲了的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先烈也表示了深切的悼念。但是，当时民盟内也确实有一些争论，而且对某些问题，特别是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责任，以及有些民盟领导人想走中间路线的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相当不一致。此外，罗隆基当时还力图在民盟领导层中排斥救国会的同志。由于对这些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这当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关心。当时李维汉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民盟内部出现的意见分歧十分重视，除周恩来同志曾对罗隆基做了规劝外，毛泽东主席还在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临行的前夕，邀请参加民盟四中全会的负责同志谈话，毛主席在谈话中十分幽默，很有风趣地讲了《三国演义》上古城会的故事。毛主席微笑着说，当时在古城的三弟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二哥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蔡阳，用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了界限，张飞于是向关羽开门迎接，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毛主席就是用这样通俗的故事，化解了民盟内部的争论。民盟内部实现了以张澜、沈钧儒为核心的团结，在解放初期，在当时的形势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些事情已过去40年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党派，又由于解放前环境的不同和很多问题没有来得及详细商量，也由于知识分子中某些人在认识和作风上的一定的局限，有些争论也是难免的和正常的。作为领导党的中共的负责人亲自出面，用谈心、规劝的形式，诚

恳地交换意见，沟通思想，化解了民盟内部的意见分歧。我们这些当事人，对40多年前的这些往事都觉得很亲切，很感动，令人永志不忘。

五

我从40年代初开始参加民盟的工作和活动，到今天已接近半个世纪了，记述这近50年我在民盟的工作和活动，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在我的回忆中，40年代，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民盟与共产党合作，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民盟在党的领导下做过一些工作，也起到了很好的影响。特别在文化教育、科技战线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无可讳言，由于在50年代后期和“文革”期间，党在一系列的工作中出现某些偏差和失误，使民盟的工作受到伤害，使很多在解放前就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就跟着共产党走的一些同志多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些问题，作为领导党的中共已承担了责任，对此，我还想说，我们这些人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胡愈之同志生前有过很深刻的自责，想起来都令人十分感动。现在民盟将迎接她50岁的生日了，我高兴地看到当年和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压迫的一些老同志仍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地为祖国的繁荣和进步，不顾高龄，不辞辛苦，积极奔走。也看到一些较为年轻，也较为有新知识，也有正义感的同志，正在承担起更为繁重的工作。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我坚信我们中国，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前途的。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一定能用科学、进步的思想战胜腐败、愚昧和落后。我们中国民主同盟是大有希望的。我寄希望于全盟的同志，特别是中青年的同志们。我也坚信在中国的大地上，将会

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团结统一的社会
主义的新中国。她将屹立于 21 世纪的世界！

1990 年 8 月 20 日于北京。

政治上的启蒙

费孝通

每个人有他的政治生命。我是依靠民盟这个组织走过来的。在发生着这样剧烈变动的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我能始终跟着全国人民一起在前进的道路上坚持下来，这不能不感激民盟给我的指引。实际上，也就是党通过民盟这个组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导。离开了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领导力量，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日子。

我和民盟是什么时候发生关系的呢？这个问题却不那么容易回答。每次填写履历表时，在这个问题上我总是得踌躇一番。是有了点年纪记忆衰退了呢，还是另有难于刻舟求剑的情景呢？生理上的变化是免不了的，许多事确是模糊了；但是如果说像这样一件在个人政治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事，脑中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难于令人相信的。

实际的情形是，那时参加一个政治组织和现在人们所熟习的那一套是不完全相同的。填表申请那些手续当时被看成是一些形式。说这些是形式就带有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意思。政治组织在我们那时候

是一种道义之交，握手成誓，用不着形式。现在不妨批评说，这是缺乏组织观念。其实也可以说，这些事情那时还没有制度化，或还没有现代组织化。总之，像民盟那种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开始时多少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结社模式，尽管向共产党学得了一些组织方面的现代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似乎并不看得那样重要。

这种缺乏组织观念的情况至少反映了当时像我那样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启蒙状态。启蒙状态是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过程。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促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并组织起来进行政治行动，是一项重要的事情。前一辈的情况我不清楚，以我这一辈来说，这件事，就是知识分子的政治上的启蒙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在抗战时期，40年代，在解放区以外的西南大后方，民主同盟在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实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促进了他们政治上的启蒙，逐步组织起来，进行当时所标榜的民主运动和救亡运动；也可以说，就是把当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引入革命的队伍。

回想一下，作为一个亲自经历过的人，怎样被引入革命的队伍，不仅是有历史的价值，还有现实的意义。当时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经过千辛万苦进入了这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山区。他们身受亡国之痛，为了光复祖国河山是甘心接受折磨和牺牲的。但是怎样才能取得抗战胜利，自己能在争取抗战胜利上做些什么事——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各有各的看法。这是说，当时后方的知识分子存在着爱国的共同立场和抗战胜利的共同愿望，但是思想上没有统一，更说不上行动上的一致。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政治觉悟，行动上的一致需要政治组织。

抗战发展到 40 年代，国民党的腐化和抗战不力已经暴露得很清楚，但是在为什么会这样，和怎样改变这状态等问题上，思想情况是很复杂的。关键问题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战、真反共”对大后方的人民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要从爱国的立场发展到革命的立场需要启蒙的过程。1941 年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对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给对国民党所抱幻想的有力打击。从那时起，我见到潘光旦、闻一多、吴晗等同志时总是要打听延安的消息，因为我知道他们和共产党是有联系的。通过这个渠道，我在政治上逐步倒向革命的一面。

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的知识分子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从政治上开始结合的。师生、同学、同乡等等常是他们类聚的基础。政治的觉悟导致原有的朋友之间分出亲疏；有些谈得拢，有些谈不拢了。有些信得过，有些信不过了。这也是政治启蒙过程中的一种表现。以我自己说，潘光旦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我进清华以前就熟识的。这个师生关系是我接受政治启蒙的基本社会关系。闻一多先生是潘先生的同学和经常来往的朋友。吴晗同志是我的老同学，但也是由于他是个常到潘先生家去的朋友所以特别熟，昵称老晗。从许多老师和同学中逐渐突出这几个人，那就是和民盟组织关系的开始。要我规定一个年月日，那是不容易的。

那时我和这几位同志的来往不仅在思想上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在行动上也配合了起来。潘先生和云南地方势力有联系，这是他的政治任务。他利用这个关系，开展对云南地方机关人员的宣传工作，由缪云台先生出面组织进步教授到各机关去演讲。我是一个有约必允的讲员。我那时生活困难，必须靠卖文补给，潘先生就介绍我为云南各报写社论，宣传进步观点，在后方起到一定的效果。吴晗同志是做青年工作的。他组